政治科學論叢／第六十期／民國 103 年 6 月／頁 43-84

爲什麼反對移工／移民？
利益衝突抑或文化排斥*

楊婉瑩**、張雅雯***

摘　要

東南亞移工與婚姻移民，兩者地緣來源相近、幾乎在同時期開始進入台灣、同樣是全球資本主義深化的結果、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同樣地居於邊陲位置、同樣面對新種族主義歧視，台灣民眾對兩者的態度有何差異？相較之下，移工被視爲經濟性的短期存在，擔負社會生產功能，也帶來物質性利益與衝突；婚移則被視爲族群性的長期共存，被期待扮演再生產角色，對於國家既有認同與文化形成挑戰。而移工與婚移在台身份與角色處境的差異，也反映在民眾對兩種移民的接納態度之別。本文採用「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 5 期第 4 次）全球化組」資料，檢視民眾對這兩類移民的態度與因素。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對不同移民群體的態度脈絡是複雜且存在差異的。團體利益同時影響了對移工和婚移的態度，但是對移工和婚移有相反的影響，中低階層民眾會因利益衝突反對移工，但也會因利益需求而更支持婚移。文化認同與價值方面，因種族歧視而產生的文化偏見態度，並不影響民眾對移工的態度，卻影響民眾對東南亞婚移的態度。其他文化價值如多元文化和民族主義，則是同時影響民眾對這兩種移民的態度，多元文化觀有助於民眾接納包容不同移民族群；強調我群概念的民族主義則造成民眾排斥移工與婚移。透過區辨移民身分之別與不同的反移民因素，有助於未來在思考在政策上，如何緩解社會上不同群體對不同移民態度的對立性。

關鍵詞：婚姻移民、外籍勞工、團體利益衝突、文化認同、團體接觸

---

* DOI:10.6166/TJPS.60(43-84)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E-mail: wyyang@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 95252503@nccu.edu.tw。

收稿日期：102 年 6 月 7 日；通過日期：103 年 3 月 1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研究動機

受到全球化的衝擊，跨越國界的移動已經成爲一個普遍的趨勢。台灣自 1980 年代末期以來，外籍移工（以下簡稱爲移工）以及婚姻移民（以下簡稱爲婚移）先後陸續來到台灣，不論其來源國殊異，經常被冠以外籍勞工以及外籍新娘等具有貶抑性的代名詞，在共同的符號背後，往往反映了社會歧視排外的思維。與此同時，多元文化的討論也逐漸受到關注，挑戰了此種排外的思維。在移民持續流動的今日，移民來源日益多元與複雜化，究竟是誰在反對移民？面對不同類型的移民，民眾對待不同移民的態度有何差異？這是本研究試圖審視的問題。

不少歐洲經驗研究指出，反對移民者，通常是全球遷徙下的輸家、社會中的弱勢階級、低階勞動者或是教育程度較低者，因爲工作機會的被剝奪以及社福資源的競爭，而反對移民（Semyonov et al., 2006；Scheepers et al., 2002）。在台灣，反對移民與否，則有比較複雜的成因。台灣主要的外來移民爲移工與婚移，兩者來自相同地緣（東南亞），可以說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深化的結果。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之下，東南亞跨國移工因爲本國經濟劣勢而被迫勞動力輸出到台灣，成爲台灣的外勞。而由邊陲國家（東南亞）輸入廉價勞動力，也使得核心／半邊陲國家（台灣）的低技術勞工（本勞），在勞動市場上容易被取代而處於劣勢，兩者（外勞和本勞）之間存在緊張關係。另一方面，在核心／半邊陲國家（台灣）屬於經濟弱勢的本國藍領男性，在父權社會上嫁下娶的婚配市場邏輯下，不容易找到婚嫁對象轉而外求；同時，邊陲國家的女性則因國內男性經濟力相對衰落，而將婚配對象轉向核心／半邊陲國家，產生兩者（本勞和外配）之間的相互需求補充的情況（夏曉鵑，2000）。在全球經濟體系下利益受損且居於弱勢的本國中下階級，一方面希望管制移工人數，保障其工作權益；另一方面，他們在婚姻市場中被邊緣化，又需要透過婚移來緩解其婚姻的需求，而相對需要婚移進入台灣。同樣的階層交錯出對於不同移民的不同態度，沒有人反對所有的移民，也沒有移民永遠被排斥。

不同移民雖然同樣受到國際資本主義邏輯的影響，然而進入台灣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產生對台灣不同的影響，也反映在國家的政策以及民眾的態度上。因爲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政策規範的結果，經濟性移民中以移工爲多數，多爲短期聚集性居留的客工，形成不同的被隔絕的生活樣貌，較少融入本國人的生活圈，對於台灣本身的文化衝擊或是實質生活的影響相對有限，主要的影響是對台灣產業發展以及就業市場。相對地，婚移則多爲長期性且分散於各家庭的居留，進入一般民眾的生活圈中，且在台居住一段時間後，[1] 取得台灣的公民身分，對於台灣社會組成產生深刻且全面性的影響。因此，移工、婚移兩種移民進入台灣後，相關政策有所不同，牽涉的層面不同，民眾對於兩者的態度，難以一概而論。

移工和婚移分屬不同移民類型，而民眾對於這兩類移民的態度有何差異？又是分別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台灣對移民態度的經驗研究，較少同時探究移工和婚姻兩種不同移民類型的情況，對於婚移的研究相當晚近，主要也是針對不同類型婚移的研究，例如陳志柔、于德林（2005）針對婚移的研究發現，「政治態度」影響了個人對不同婚移群體的立場，個人族群和國家認同都影響了民眾對陸配和外配取得公民權的態度，其中政黨支持與族群成見只影響民眾對陸配取得公民權的態度，但並沒有影響對外配取得公民權的態度，研究也發現經濟自我利益和社會接觸經驗並不影響民眾對移民政策的態度，而是受到政黨動員與政治論述的影響。伊慶春、章英華（2006）比較民眾對於娶外籍與大陸媳婦的態度，該文旨在釐清「社會接觸」相對於陳文「政治態度」的影響效果，研究發現政治傾向確實有影響，但社會接觸的影響力也很顯著，社會接觸對民眾看待外籍配偶/大陸配偶有正面效果。蔡明璋（2011）檢視前兩份研究資料的限制，利用不同資料來源再次探討「社會接觸」的影響。研究顯示社會接觸對於降低對外籍配偶的偏見，並未產生實質的效果，跨族群的接觸效果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下才有可能。張翰璧、張晉芬（2013）研究則加入民眾對移工和婚移立場的比較，模型發現個人基本背景和既有的族群印象都會影響民眾對

[1] 我國婚姻移民人數以東南亞配偶和大陸配偶爲最多，一般而言東南亞配偶取得我國公民身份的時間約 4 年，大陸配偶取得我國公民身份的時間約 6 年，由於本文研究對象以同樣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婚姻移民和移工爲主，後續資料分析暫且不討論大陸配偶的情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移工和婚移政策的態度，而社會接觸經驗則有矛盾性的效果：一般接觸經驗對民眾接納移工有正面效果，但實質社會接觸對開放移工和婚移的態度反而產生負面效果。因此該文認爲接觸經驗或許能增進個人間的親近性，但卻不足以解除民眾對更多移民進入台灣的疑慮（2013：159-160）。

上述台灣對移民態度的研究，屬於剛起步的先驅性研究，其中浮現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究：一是國內對移民態度的討論大多集中在婚移，但是東南亞與大陸配偶兩者之間的差異很大。兩者受到不同法規規範，大陸配偶因爲敏感的兩岸政治關係，受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下一國兩區的規範，與一般外國移民的差異相當大。而在這些研究中所探討的問題（依變項）也不盡相同，有的研究是針對是否賦予婚移公民權（陳志柔、于德林，2005），也有針對婚移的社會距離（伊慶春、章英華，2006），更有針對是否支持增加婚移人數以及政府補助（蔡明璋，2011）。其中，公民權的概念乃是高度政治性的，相對容易受到政治傾向的影響，在面對大陸配偶時，政治影響更明顯，而社會距離較容易受到社會接觸的影響。這些不同研究所探討的問題在層次上乃是不一樣的，因而難以有一致的歸因與解釋。

相對地，同樣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與移工，兩者來到台灣時間相近、地緣上相近、同樣是全球資本主義深化的結果，在國際分工體系上同樣居於邊陲位置，民眾對兩者的態度有何差異，則是缺乏相關比較研究。就兩者的相似處境來看，台灣的東南亞移民在文化語言上雖不盡相同（越南、泰國、印尼等），卻經常被等同視之爲來自落後國家而遭受歧視性對待，曾嬿芬（2004：46）以「他者中的他者」（others within others）來解釋東南亞移工的共同處境，此概念源於 Etienne Balibar（1991，轉引自曾嬿芬，2004）的新種族主義（neo-racism），不像舊種族主義有具體的族群／種族指涉性歧視，新的種族主義不必然連結到特定的種族類屬的歧視，是一種「沒有種族的種族主義」（racism without races）。東南亞移民被差異對待者只因爲他們是第三世界的移民，其文化差異在宰制結構下被轉化爲不相容的自然的差異。另一方面，東南亞移民又可能因爲國籍差異，進一步被建構爲種族化、根本性的文化差異，以利於國家進行移民的篩選排除，此種種族界限的社會建構，乃是反映社會對「階層化的他者」的文化想像（藍佩嘉，2005）。同樣處於國際分工體系中邊緣位置的東南亞移工與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移，台灣社會可能將兩者歸爲同類而歧視對待（同爲他者中的他者），也可能進一步區別化地對待（階層化他者），東南亞移工與婚移既相似又不盡相同的處境，需要更進一步地比較與了解。

再者，台灣既有研究雖然是針對婚移的研究，但採用的理論解釋多爲移植歐美移民相關研究的理論框架，有的是參考自歐美種族與族群關係的研究，有的則是參考自歐洲對移工態度的研究，這些不同類屬的移民所適用理論不盡相同，但在探討對台灣婚移態度時，則被不加區別性地引用爲相關解釋。歐美相關理論解釋能否普遍適用的困難在於，各國移民現象的發展時間先後，以及移民樣態與脈絡，存在著各種差異。美國相關研究早期乃是關於黑白種族衝突，而後則是針對拉美裔的討論居多。歐洲早期主要移民國家的移民多來自於前殖民地或是移工及其家人和後代，各國移民的來源皆不盡相同（例如法國移民主要來自於前殖民地北非、德國移工主要來自於土耳其、英國來自於前大英殖民地非洲印度大洋洲等），不同移民來源產生的族群距離以及文化差異也有所不同，對待移民的政策從排除到包容也各不相同。跨國研究爲求可比較性以及提出一般性的理論解釋，往往簡化了移民的樣態，將之統一視爲外國移民，加以操作簡化之後進行比較。此種跨國研究對於反移民態度的解釋，經常出現概念轉化爲測量可相比性的問題（Davidov, 2009），或是解釋難以普遍化的困境。

反移民的態度，有跨國的相似性，更有各國在地的差異。即使在同一國內，針對不同的移民類別，民眾的態度也可能不盡相同，解釋上適用於不同理論。在台灣，移民最主要有兩大不同類屬，移工和婚移，在探討反移民態度上，也需要重新檢視比較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對不同移民的態度。本文研究對象將聚焦於東南亞移工和東南亞配偶之比較，如前所述，國內移民研究多針對個別移民類別討論，少跨越不同移民類別作探討，且同樣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和婚移兩者有相似背景卻又屬於不同類別的移民性質，正提供研究者一個立基點去比較移工與婚移在台灣的處境與差異。本研究針對反對移民的相關理論解釋進行討論，進而透過實證資料「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 5 期第 4 次）全球化組」，來檢驗對民眾對兩種移民的態度有何差異，以及排斥移工與婚移的解釋爲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貳、研究背景：兩種移民，不一樣的月光

台灣的移民中多數來自於東南亞的移工和婚移，兩者同時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但也受到台灣不同的移民政策的規範，成爲兩群不同的移民類屬，並對台灣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認同等形成不同的挑戰。民眾對兩者態度之別，主要源於國家政策不同規範對兩者不同的定位，以及兩者所扮演的社會功能角色的差異。以下透過對台灣兩種移民身分與處境的討論，可以初步了解何以反對移工和婚移的原因是不同的。

一、利益需要與衝突下的移工

隨著經濟發展，1980 年代以來台灣因產業結構改變和教育水準普遍提升，導致基層勞動力短缺，爲了解決勞力短缺問題，勞動力輸入成爲國家的經濟緩衝模式，並於 1990 年代對移工引進管理，進入法制化階段。[2] 起初國家對移工的定位僅在補充國家擴張工程建設所需的下層勞動力，而後在民間企業以「資本罷工／出走」向政府施壓，才大量開放移工（蔡明璋、陳嘉慧，1997：72-73；曾嬿芬，2004：16）。而自「就業服務法」與「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制訂以來，我國經濟移民大致可區分爲白領專業人員和藍領勞工兩大類（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3] 白領勞工和藍領勞

---

[2] 我國首度招募移工可回溯到 1989 年政府因公共工程建設所需，通過「14 項重要建設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以解決基層勞動力短缺問題（蔡明璋、陳嘉慧，1997：71）。1991 年制訂「因應當前人力短缺暫行措施」，開放六大行業，主要是營造業與製造業的勞力輸入，1992 年「因應家庭照顧殘障者人力短缺暫行措施」，開放外籍監護工，同年立法院訂定「就業服務法」以及「外國人聘僱及許可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正式完成臺灣移工引進的合法基礎（蔡明璋、陳嘉慧，1997：72-73；曾嬿芬，2004：13-14）。

[3] 移工又可分爲「產業外籍勞工」、「社福外籍勞工」。前者爲從事「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規定之海洋漁撈工作、製造工作、營造工作。後者爲從事「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規定之家庭幫傭工作、機構看護工作、家庭看護工作」（勞動部，2014）。白領和藍領兩類外籍工作者在入境、居留、出境的相關事宜適用不同的法規條文、主管機關也不同，來台工作時間限制、職業和產業的限制、配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工因其階級差異被以不同政策規範對待。在台工作的外籍工作者至今（101 年 12 月）已有 473,203 萬人，其中白領外籍人士約佔 5.84%（27,624）（勞委會職訓局，2012a），藍領移工則爲多數佔 94.16%（445,579）（勞委會職訓局，2012b），自 1997 年來已增長近 20 萬人，可見我國經濟性移民以藍領移工爲多數。

政府當前官方的外勞政策以優先聘僱本國勞動力爲主，補充國內招募不足之勞動力，故採補充性原則引進移工（勞委會職訓局，2010）。移工就被定位爲不能久居的「客工」，外勞政策有計畫引進勞動力，但所有政策規定都必須確保移工只能在國內短期居留、工作，但不能成爲長期居民與工作者。[4] 且開放移工的產業類別與數額是有限制的，[5] 對移工做嚴格居留管理爲主要特色（曾嬿芬，2004：31；蔡明璋、陳嘉慧，1997：82-83）。相較歐美，藍佩嘉（2008）指出亞洲客工制度是最爲嚴苛的，亞洲地主國普遍有領土有限、人口密度高以及種族同質性強的特點，對外來移民的管制普遍嚴格，例如配額管制、工作證及保證金等，目前沒有一個亞洲地主國允許低階的移工入籍歸化，不像美加移工有權利與資格在居留一定年限後取得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但這些嚴苛外籍工作規定並不適用專業技術的移民（藍佩嘉，2008：58-60）。

在客工的定位下，我國外勞管理政策尤其嚴格，以社福外勞政策爲例，受僱移工是依據移入國勞力需求而進入特定的勞動市場，並沒有轉化工作的自由，無特殊理由無法轉換雇主，當然也沒有自由遷徙工作地點的權利。加上外籍家戶勞動者被視爲過渡性、補充性的勞力，所擁有的工作機會只是在特定期間的勞動，並被排除獲得公民身份的機會，也不受基本工資、工時或勞工的保障。外籍家戶勞動在現行法令上定位爲「補充性」、「隨時可替代」、「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無法永久居留」的工作年限，用

來源國限制、不得任意換雇主、工作地點等規定皆不同（曾嬿芬，2004：39-40）。

4 就業服務法 52 條規定，移工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爲 3 年，得來台工作兩次共 6 年，2008 年後移工可延長到 3 次共 9 年（藍佩嘉，2008：82），2012 年再修改爲累計不得逾 12 年。

5 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規定，每年得引進總人數，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勞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補充國內不夠完善的照顧體制及需求（吳秀照，2006：32、37）。

那麼，引進移工對於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及薪資，是否有所影響而造成本國勞工失業，進而使得本國勞工反對引進移工？部分研究指出移工是有可能造成本國勞工失業（蔡青龍、林季平，2000；江豐富，2006）。李誠（2007）研究發現，2007 年以前移工與本勞處於隔離的勞動市場，引進移工並不會排擠本國勞工就業機會，但 2007 年之後，移工與本勞的市場區隔開始模糊，而出現移工替代本國勞工的效果，排擠到國人就業機會。即使並未直接排擠到本勞的就業機會，但是移工的引進，卻給予資本家較大的議價與勞動撿擇（本勞與移工）空間。劉梅君（2000）指出，台灣的客工政策，往往造成移工的「生產」與「再生產」分離，使得移工的「經濟性價值」和「社會性價值」被分開處理。透過排除性規範（居留工作期限、勞保給付限制），以及篩選性手段（技能水準、健康檢查、單身條款），國家和資本家得以極大化地榨取移工的經濟性與生產價值，而不用負擔移工的社會權和再生產成本。雇主在不需要負擔移工的再生產成本，使得移工的工資相對低廉。受限於不平等的勞動契約關係，雇主不需要負擔一般雇傭關係下的責任義務（資遣費退休金等），且有控制移工的各種手段（不得更換雇主與工作地點、扣留護照），也造成勞動控制的訓誡作用。此效果不限於對移工，對於本勞而言，因爲其有生產與再生產成本需要，而移工使得其可被取代性增加，使得本勞工作薪資與勞動條件的議價籌碼更低。

二、她群或是我群的婚移

外籍配偶在台灣的出現和移工時間相近，主要都是在 1980 年代末期，而其背景也都是源於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夏曉鵑（2000）指出，在國際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之下，台灣處於核心和邊陲之間的半邊陲位置，開始擴大與依賴邊陲國家來擴大市場以及取得廉價勞動力，其結果是台灣大量工廠倒閉以及勞工被解雇，鄉村與低階勞動者在本國經濟與社會地位下滑，在男下娶女上嫁的婚姻制度裡，底層階級男性不易在國內取得婚配對象。同樣的國際形勢也出現在邊陲國家（東南亞），因勞動力流入半邊陲國家，使得其鄉村經濟破產，處於邊陲國家的女性則因國內男性經濟力衰退，往外轉向核心與半邊陲國家尋求婚配對象。外籍配偶乃是國際經濟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工體系下，被邊緣化的男女勞動者的生存延續策略。婚移與移工兩者同樣是國際資本主義分工催化的結果，然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涉及的是誰可以成爲國家成員的我群，而後者由於政策規範，很明確地被定位爲具有生產性的他群。就目前我國婚移的發展趨勢，外籍配偶和大陸配偶從 2004 年的 33 萬人口，一直穩定成長到 2012 年 46 萬多的人口數，其中取得定居證或歸化、取得國籍者大約近 20 萬人。婚移中包含大陸（港澳）配偶以及東南亞配偶，前者人數雖多，但大陸配偶在身份權利規範上不隸歸屬於移民相關法規管轄，同時本文爲與東南亞移工進行比較，因此主要討論爲東南亞的婚移。

我國對於婚移的政策，相較於移工政策制定來得被動（夏曉鵑，2005）。東南亞婚移初期由市場婚姻仲介推動，政府並無相關規範。隨著移民人數的增加與事項複雜化，也出現制定全面性的移民規範與成立專責機構的需求。1999 年立法院通過「入出國及移民法」，隨後修訂「國籍法」，建立了規範移民的基礎法規，並界定婚姻移民的歸化及身份權利，於此之前婚移居留並無法律的規範。並於 2005 年通過「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賦予設置移民署專責機構之法規依據，並於 2007 年設立隸屬於內政部之移民署，全權管理入出國及移民事項。這些法令與制度組織的建立，不僅出現時間較晚，其規範的內容，也反映出國家對於婚移的公民身分與公民權利的質疑與猶豫。

婚移從入境、身分取得、市民自由權、社會福利權、以及政治權等受到不同程度的諸多限制（楊婉瑩、李品蓉，2009）。政府限制婚移的進入，透過對外籍配偶嚴厲的入出境面談，以及入境後進行的流動人口查察措施，明示以防制「虛僞婚姻」爲目的，以進行戶籍控管並限制移民居住遷徙之自由。[6] 此外，外籍配偶歸化時必須滿足財力證明的要求，對於社經

[6] 2007 年移民署成立後，入境面談及户口查察佔其人力編制及預算編列之大宗；行政院於 2008 年 3 月 10 日核定之人口政策白皮書，更以「強化國境管理」、「防制非法移民」爲移民政策列管追蹤的六項推動策略之二。此外，雖然近年來在移盟團體壓力下修法對外籍配偶人權相對有所進展，自 2008 年至今，政府又進行第二波大幅的立法與修法。2008 年修訂「國籍法施行細則」放寬外籍人士申請歸化之財產限制；內政部移民署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5 條之授權，制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對弱勢的婚移，此種階級歧視往往成爲做台灣人的經濟門檻。這些規範與限制的根源在於，對於外籍配偶的種族文化歧視以及內部認同的焦慮。東南亞婚移的存在對於「誰是台灣人」以及「誰是我們」的定義與界線提出挑戰，也因此國家透過各種國境管理辦法與規範，來限制避免讓「她者」成爲「我們」（陳雪慧，2007：90、96；廖元豪，2006：82）。而傳統上台灣以「血統主義」來定義國民的組成，婚移的大量移入，迫使國家定位由「非移民國家」被動地轉變爲「移民國家」的方向移動（夏曉鵑，2005）。

即使婚移女性取得了形式上的公民身分（formal citizenship），但也很難享有實質公民權（substantive citizenship）（Hsia, 2009）。婚移的實質公民權實踐往往面對社會歧視與國家政策的雙重障礙。外籍配偶的工作權因爲社會歧視經常只能從事三低工作、教育權因爲語言不通與學歷認可受限難以實現、社會福利權也必須取得戶籍的國民方可分配社福（趙彥寧，2004）。近年來，政府爲改善外籍配偶處境，2003 年制定「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以及 2005 年設立爲期 10 年共 30 億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等，試圖透過有別於國民的特殊社福管道，來補充與照顧婚移的社會福利權。但各種移民輔導方案，以東南亞（中國）外籍配偶而非歐美外籍配偶爲對象，仍有深化社會的族群歧視之虞。而以特殊預算（外籍配偶基金私房錢）來進行補助，乃是爲了避免排擠國民所享有的經常性社福預算，將外籍配偶視爲社福體系的二等公民。婚移的階級弱勢以及文化種族差異，成爲國家以國民身分進行資源分配差異化的藉口，將本國人與婚移進行了多寡不均的差別對待，以及試圖透過各種輔導措施加以補強矯正的缺失。

綜合上述，比較兩種移民在台灣的處境，移工因爲勞動力輸入而移動，且在政策規範下被定位爲短期性、隔離、補充性的非公民角色，因爲經濟利益而使得其存在被認可，然而階級與種族文化的歧視，使其被排除成爲公民的可能。而婚移則是因爲婚姻關係而被納入移入國，雖同樣受到種族

實施面談辦法」；然而婚移即使通過入境面談與戶口查察，但在要轉化爲國民過程中，對於外籍配偶歸化要求財力證明以及大陸配偶要求保證人制度（通常是先生），仍顯示了國家對婚姻移民成爲公民的階級歧視以及父權控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化階級性歧視，但因其再生產功能得以延續台灣男性的民族血脈而被認可爲公民，且在全球資本主義深化的危機下，補充了臺灣經濟弱勢家庭的生產與再生產需求，但因涉及到歸化與文化國族認同的問題，民眾對婚移的態度相對更爲複雜。

如同夏曉鵑（2005）的觀察，有些婚移女性強調她們與移工的不同在於：她們是來做「台灣人」的，不像移工是來「賺錢的」。此種婚移與移工的彼此認知方式，主要來自於媒體報導以及社會歧視，也反映出一般民眾對這兩個群體的態度。這樣認知的差異反映出，移工被視爲經濟性的存在，文化社會面向被制度性地貶抑排除，其擔負的是台灣社會的生產功能；婚移則被視爲族群性的存在，其所攜帶的族群文化與認同，對於國家認同形成挑戰，也是國家試圖規訓和控管的，因爲其擔負了國家公民的再生產角色。而這樣的差異，也反映在對兩種移民群體的不同社會態度：對於移工的排斥，和經濟性利益動機較爲相關；而對婚移的排斥，則更可能是源於文化性與認同性的因素。在相關反移民研究中，經濟利益衝突以及文化認同等理論解釋，也經常被論及，以下將進一步說明之。

參、理論探討

對待移民與反移民態度研究，1990 年代開始受到重視。雖然相關實證研究的發展時間相當晚，但不同領域提供對移民態度不同的理論養分。[7] 各種理論之中，解釋對移民態度最廣爲討論引用的，是由社會心理學所發展而來的相關理論。其主要解釋涵蓋了因個人社會位置、經濟因素、以及政治態度價值等因素，產生對移民的態度。Ariely (2011) 指出社會心理學對移民最大貢獻，是將個人與社會系統連結，檢視社會結構位置與個人態度認同之間的關係。在此傳統下，多數研究採用團體利益、團體文化認同以

[7] 社會學中，社會環境脈絡、人口比例、年齡與教育解釋了個人移民態度；經濟性因素中，經濟剝奪感提供了反移民態度的解釋。政治學傳統中，保守主義、政治無效能感以及意識形態往往連結到反移民態度。而社會心理學，則是強調團體間的接觸、民族認同、威權主義、以及社會宰制理論以及威脅感受會預測個人態度（Cohrs and Stelzl, 2010；Pettigrew et al., 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團體接觸等理論，來解釋對移民的態度（Ceobanu and Escandell, 2010；Savelkoul et al., 2010；Schneider, 2008；Sniderman et al., 2004）。以下分別就這三個主要理論加以說明，並由台灣移民不同類別來觀察其可能適用解釋。[8]

一、團體利益衝突

這些理論中，最能解釋移工對於本國人民造成的衝擊，以及民眾回應的態度者，理當首推團體競爭理論或稱現實團體衝突理論（realistic group conflict）（Blumer, 1958；Bobo and Hutchings, 1996；Hardin, 1995；Scheepers et al., 2002）。該理論主張由於資源與利益的衝突，導致團體間的競爭與敵對態度。Blumer (1958) 提出偏見理論（theory of prejudice），認爲群體間的偏見乃是優勢群體特權受到威脅的反應，宰制族群意識到邊緣族群的威脅而產生的偏見。後續研究將團體間的競爭區分爲實際（actual）的競爭關係以及主觀（perceived）的競爭感受，兩者都可能帶來威脅感，進而產生對少數群體的敵意（Blalock, 1967；Bobo, 1988）。此理論可以解釋一般本國人民對移民的態度，偏見乃是本國或主流族群，感受到其利益或特權受到外來族群威脅時的防衛性反應，特別是當本國經濟景況不好時，本國人感受到的威脅或是實際的利益衝突將更形尖銳，對移民態度越不友

[8] 除了上述解釋民眾對移民態度的三大理論之外，還有諸多解釋，其中意識型態與價值往往有重要影響。例如 Pettigrew 等人（2007）在誰反對移民一文中，對於移民態度的解釋側重於社會位置脈絡、個人特質、接觸、經濟、政治、認同以及團體價值態度（group-focused enmity）有關。就個人背景來看，反對移民主要來自於年老世代、教育程度較低者，以及居住在反移民的社區並缺乏與移民的接觸經驗者。就價值面向而言，反移民態度也與政治保守主義、疏離、威權主義、社會宰制傾向、恐同反猶、以及預期威脅等相關。Cohrs 和 Stelzl (2010) 也同樣強調意識形態對移民的影響，包括了右翼的威權主威（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RWA）以及社會宰制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影響了對移民團體的態度，而這些意識形態的影響乃是受到脈絡因素的影響。針對 17 國跨國資料分析顯示，在認爲移民影響其經濟與犯罪率的國家（如德國和義大利），右翼權威主義有效預測反移民態度。而在移民失業率較高的國家（如加拿大），社會宰制傾向對於反移民態度具有解釋力。不過因爲這些研究解釋和三大理論的解釋有不同程度相關，且和本文重點爲比較兩種移民討論較無直接關聯，在文中暫且不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善。

早期許多歐洲反移民態度的研究，都將重點放在本國國民和移民之間的利益矛盾的角度來加以解釋。Quillian (1995) 的研究可以說是早期討論歐洲反移民的文章的代表，對歐洲 12 國的實證研究指出，主流族群的威脅感受，顯著地影響對少數團體和移民的偏見。在非歐洲移民人數相對較多以及經濟條件較不好的歐洲國家，反移民的態度越形升高。而此種團體威脅乃是集體現象，個人態度受到團體間關係的影響。Scheepers 等人（2002）針對歐洲 15 國跨國研究，檢視個人位置條件（教育收入職業等）受到集體脈絡條件（外籍移民人數以及失業率等）的影響，研究發現低階勞動者處於競爭性環境（非歐洲人比例越高者）者會視移民團體爲威脅，有越高的排他性。McLaren (2003: 916) 和 Scheepers 等人（2002）用相同資料庫，得到類似結果——對於資源競爭的恐懼只有在相對資源弱勢的情境才會出現，也就是對於在低社經地位的個人，大規模的移民往往容易形成威脅感受。Meuleman 等人（2009）延續 Quillian (1995) 以來關於團體威脅的研究，分析歐洲 17 國反移民態度的變化，並以動態群體衝突理論途徑，來解釋反移民態度。研究顯示，各國移入人數的規模以及經濟處境如失業率的變化，都會影響到對移民態度的變化，移入人數越少以及失業率越低都會降低對移民的敵意。

二、團體文化與認同威脅

移民不僅帶來利益競爭的威脅，也帶來文化與認同的挑戰。特別是在台灣的婚移，早期由於政策的關係，進入台灣社會後，通常擔負家庭中的照顧工作，即使在外從事工作也被視爲貼補本國弱勢家庭的經濟需要，因而對本國人的物質性威脅不大，對婚移的排斥主要來自於社會排斥以及文化認同歧視。也因此，本研究也認爲相對於資源競爭理論，社會認同理論更能解釋對於婚移的態度。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預設團體間的敵對態度，乃是源於團體的分類與區別化（categorization）的過程的結果（Brown, 1995；Capozza and Brown, 2000；Tajfel, 1981；Turner, 1981），此區別的過程，一是透過對我群的正向認同，個人對社群產生歸屬感；二則透過對他群的反向認同，產生貶抑他群的偏見（Social contr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dentification）（Billiet et al., 1996）。當群體之間存在明顯可辨識的差異，不論是基於種族膚色宗教或是文化傳統等，可辨識的文化差異與分類，往往成爲排斥異族的原因。東南亞外籍配偶因語言文化的差異所產生的溝通藩籬，也往往成爲我群與她群的區辨性來源。

社會認同理論強調我群驕傲與他群威脅之間的關聯性，但在經驗研究上，兩者的關係則顯得複雜許多。從社會認同理論發展而來的移民研究中，不少研究著墨於社群認同如民族主義和反移民態度之間的關係（Billiet et al., 2003；De Figueiredo and Elkins, 2003；Pettigrew et al., 2007），但結論不一。有的研究認爲強國家認同與對移民的負面態度之間存在正相關，但許多研究也指出兩者關係並非直接相關，而是受到許多其他因素影響。我群認同是否會爲了維持團體認同的獨特性，產生對他群的偏見乃至於排斥，缺乏相關證據佐證（Brown, 2000；Pehrson et al., 2009）。Allport (1954/1979) 最早指出，對我群的效忠和他群的敵意之間並無必然關係。Brewer 和 Campbell (1976) 研究東非 30 個族群間關係，發現偏愛自己社群不必然對其他族群抱有敵意，雖然幾乎所有團體在是否值得信任、友善以及誠實等面向，對內團體的評價高於外團體，但是對內團體的正面評價與對外團體的社會距離的相關性極低。De Figueiredo 和 Elkins (2003) 也指出，任何試圖在我群認同與他群偏見之間建立普遍性的因果關係，乃是錯誤的，因爲忽略了社會認同本身可能的特定定義與內涵。

前述兩種理論，一則建立在理性利益衝突，一則建立在象徵性文化與認同矛盾，都強調團體間的競爭與緊張關係，影響了對移民的態度。反移民的態度，不論是源於利益或是認同的考量，前提都是認知到移民威脅的存在，只是此種威脅感可能是源於客觀的社會物質條件，也可能是主觀的文化與心理態度。晚近部分實證研究顯示，經濟利益的影響不如社會文化認同的影響。Sniderman 等人（2004）針對荷蘭研究顯示，文化認同因素比經濟利益更能引發反移民的排除性態度，作者認爲或許是由於荷蘭經濟發展條件相對成熟，反移民態度主要是來自於認爲移民族群威脅荷蘭文化者。McLaren 和 Johnson (2007) 研究英國人的反移民態度，採用 2003 年英國社會態度調查結果顯示，個人利益對於反移民態度並無顯著影響，一般英國人更關心的是移民帶來的對英國文化傳統等的影響。Sides 和 Citr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7) 探討歐洲多國對移民態度，同樣比較認同與利益兩種解釋，並加入資訊因素。研究顯示，文化象徵性認同，相較於經濟利益在統計上有較強的顯著影響。不同於理性團體競爭理論，各國對移民態度的差異，多數與整體因素如移民人數或是整體經濟無關，反而是高估移民人數，不充分的資訊會誤導對移民的態度與判斷。而個人經濟的焦慮雖然有影響，但強度沒有文化認同高。Schneider (2008) 解釋跨國反移民歧視也有類似的發現，團體間的經濟利益競爭對於跨國間反移民態度的解釋不如預期，陌生不熟悉以及擔心價值與文化衝突是解釋團體規模與反移民態度的主因。

晚近歐洲研究中似乎有逐漸從利益威脅解釋轉向文化認同衝突的解釋，這和移民現象的變化或許有很大的關係。歐洲移民初期以短期移民爲主，但逐漸成爲長期移民後，從立即的利益競爭轉爲深刻的文化矛盾，或許能解釋這種轉變的原因。然而，經濟利益衝突的解釋力，仍然扮演一定的角色。而區分台灣的移工和婚移，同樣可以預期，前者是短期性的移入，牽涉到理性利益的考量；後者則是長期的移入，涉及到長期的情感文化認同問題，也因此對兩種不同移民的社會接受與否應有所不同的成因和社會組成。台灣既有針對婚移的研究，主要是比較民眾對不同的婚移（東南亞 vs. 大陸）的態度，受到政治認同與社會接觸兩種因素的影響（陳志柔、于德林，2005；伊慶春、章英華，2006）。相對於既有研究探討的是同樣身分（配偶）但不同文化區域來源的婚移，本研究重點則是放在同樣來源（東南亞的移民），但因爲身份的不同（移工 vs. 婚移），社會矛盾如何影響對不同類移民的對待方式？由於兩種移民身分的差異，利益衝突與文化認同因素對於兩者是否有不同的影響，則是本研究試圖探究的課題。

三、 團體接觸理論

另外一個解釋對移民態度的理論，則是團體接觸理論，認爲族群或團體間的接觸將會減低對少數族群或移民的偏見（Allport, 1954/1979；Pettigrew and Tropp, 2006；Wagner et al., 2006）。Allport 強調團體間若持續接觸將有助減少對他群的偏見，特別是在有利的條件如：團體間具有平等地位、共同團體目標、團體合作、以及對權威法律或習俗的支持等這些條件下，團體間的接觸將有利於合作以及減少偏見。Pettigrew (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ttigrew 和 Tropp (2006) 則指出不必然需要這些有利條件，團體接觸對於減少團體偏見乃是直接而有效的（McLarean, 2003；Sides and Citrin, 2007）。伊慶春、章英華（2006）對台灣婚移的研究也顯示，社會接觸對民眾看待外籍配偶／大陸配偶有正面效果。相對地，蔡明璋（2011）研究則顯示社會接觸，並無法顯著降低對外籍配偶的偏見，跨族群的接觸減少偏見的效果應該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下才會產生作用。

團體接觸理論和前述的團體競爭或認同威脅理論之間具有互補性，移民人數規模越大可能帶來競爭也可能帶來威脅，然而競爭會刺激反移民態度，接觸則可能會減緩敵對態度。Schneider (2008) 指出兩套理論間的關連爲接觸互動假設（contact interaction hypothesis），大規模的移民與對移民的偏見兩者之間的關係乃是非線性的（curvilinear）。接觸機會增加而產生的熟悉感，具有調和大規模移民產生的經濟競爭和文化威脅的效果。此外，團體接觸包含了一般性和實質性不同接觸方式，對於降低對移民態度的效果也是不同的。Savelkoul 等人（2010）透過民調資料探討荷蘭反伊斯蘭移民的態度，檢視族群競爭以及團體接觸理論兩者的互補關係。該研究發現，和伊斯蘭移民越多的一般性接觸不會改變對移民態度，但與少數族裔同事的接觸會減少對伊斯蘭團體的負面觀感，且調節了個人反伊斯蘭態度。接觸的效果也可能受到脈絡因素的影響，例如 Bilodeau 和 Fadol (2011) 利用跨年度選舉民調資料檢視澳洲英語族群對於移民的態度研究發現，經濟因素如個人收入和就業對移民態度影響較弱，但個人對經濟的主觀評估則會有影響，至於移民接觸（社區族群多元性）的影響究竟是正面或是負面並無必然關係，乃是取決於該地區的教育程度和經濟發展。同樣是身處於移民接觸較多的多種族的社區的民眾，若是社區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則對於移民相對友善，反之，低教育區域則相對不友善。

簡言之，上述三種反移民的競爭性理論，主要是由團體互動中發展出利益衝突、文化認同威脅、以及接觸等各種解釋，各適用到不同的移民類別。隨著全球化深化，移民者跨越國境的身份也越趨多樣性，民眾對不同身份屬性的外來移民者也可能存在態度差異，而過去文獻卻較少探討民眾對這些不同移民身分的態度差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研究方法

連結前述理論探討，以及移工與婚移在台灣處境的比較，究竟團體利益、象徵性文化價值和社會接觸理論是否能適用在台灣社會對移工和婚移態度上？就經濟移民而言，本文假設，團體利益解釋最能理解臺灣社會對移工的態度，因爲牽涉到團體間實質利益的衝突，在台灣的經濟移民中多數是移工，而移工和本國勞動力之間出現存在的抵換關係，鞏固了市場中既有的贏家和輸家，資本家有更多的勞動力選擇，而本國低階勞動力的移動彈性少，被替代性提高，也造成本勞和移工之間團體利益的威脅感受或是直接衝突。相對地，婚移進入台灣社會後，對於文化社會乃至於政治各層面的影響皆產生影響，但是由於婚移多受社會歧視，初期不容易進入主要的勞動市場，因此經濟性利益矛盾並非主要因素，但是文化差異與族群認同的衝擊，則是在婚移轉化爲公民的過程中逐次遞增加強，成爲最主要的解釋。至於社會接觸的解釋，以往文獻指出，社會接觸有可能產生熟悉感而降低反移民的態度，也可能會因爲接觸而強化排斥，既有文獻未有定論，台灣民眾和移工和婚移的相處模式亦有所不同，本文也將透過資料分析來檢視接觸對於兩種移民的態度是否有不同的影響，乃至於減緩利益與文化因素的衝擊。

因此，當討論國內民眾的移民態度時，本文區分不同移民的身份類別，檢證研究假設以及與現今不同的移民理論進行對話。本文以臺灣移工和東南亞婚移爲例，探究國內民眾對不同移民的態度以及原因。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爲「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 5 期第 4 次）全球化組」，執行單位爲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持人爲張苙雲），調查時間是 2008 年 7 月，其調查對象爲 18 歲（含）以上之臺灣民眾，成功樣本則是 2,067 人，不過本文選取的樣本對象爲 20 歲以上，並採取蔡明璋看法，假設娶婚姻移民者應是特殊性樣本（假定 100% 支持開放婚姻移民），不適合做爲預測因素（蔡明璋，2011：7），本文排除娶外籍配偶之受訪者後，最終分析樣本數爲 1,983 人，並以「加權後」資料作爲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民衆對不同移民人數之態度

爲了檢視民眾對這些不同移民者的態度與因素，以問卷中「您認爲在臺灣工作的外國人數應該增加還是減少？」作爲民眾是否接納移工之測量，並以「請問您認爲在臺灣東南亞籍新娘的人數應該增加還是減少？」作爲民眾是否接納婚移之測量。從表 1 可觀察出民眾對不同移民者的接納態度：多數民眾傾向減少外來移民人口。就不同移民身份來看，民眾傾向減少東南亞配偶人數的比例（64.2%）高於減少外國工作者的比例（59.6%）。再者，不減少移民人數的比例中也可發現，民眾贊成增加東南亞配偶人數比例（6.3%）遠低於增加在台工作之外國人數比例（16.7%）。

表 1　民衆對不同移民人數之態度

	增　加	不　變	減　少	樣 本 數
在台工作之外國人	320 (16.7%)	457 (23.8%)	1,146 (59.6%)	1,923
東南亞配偶	119 (6.3%)	564 (29.6%)	1,224 (64.2%)	1,907

註：請問您認爲在台灣工作的外國人數、東南亞籍新娘的人數應該增加還是減少？
資料來源：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張苙雲，2008）

整體而言，雖然多數民眾對於外來移民的態度多採限制立場，但民眾對東南亞配偶的接受度又低於在台工作之外國人。換言之，即使是反對外來移民，民眾對接納不同移民身份的態度還是存在差異，故，本文將檢視民眾對不同移民身份的排斥程度分別受哪些因素影響。此次依變項的操作上，將重編爲「減少」與「不減少」兩類別。

二、解釋因素

爲了探究民眾對不同移民類型的態度因素，本文將從團體利益、文化認同以及社會接觸三種理論來解釋民眾對移民態度的差異，以下分三個面向分別建構出不同變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㈠ 團體利益面向

在團體利益的面向中，全球資本深化中利益受損團體和階級，以及主觀上對全球化經濟評價差的民眾，都可能反對移民浪潮。故本文將以「民眾對全球化的經濟評價」[9]、「教育程度」、「職業階級」以及「都市化程度」作爲變項。

「民眾對全球化的經濟評價」是採用問卷中「各國及各地區之間人、物與資金的交流一直增加，您認爲對台灣的經濟好還是不好」、「對台灣人的工作機會好還是不好？」兩題爲指標分數；「教育程度」則區分爲「小學以下、國高中、專科、大學以上」四類由低至高的程度；「職業階級」也依階級高低分類出「高階白領階級和專業人士」、「中低階白領階級」以及「藍領階級」；由於都市化程度也可能呈現出核心－邊緣的利益受損關係，因此本次研究也納入「都市化程度」，依民眾主觀認爲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屬於「大都市」、「大都市旁的郊區」、「小城鎮」、「鄉村」來測量。本文假定教育程度低、藍領階級以及鄉村人口可能是全球深化下的利益受損團體，以及對全球經濟評價差的民眾，都可能擔心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因而反對外來移民。

㈡ 文化認同面向

以往研究發現民族主義、族群威脅等我群／他群的價值觀，將影響國內民眾對移民的接受或排斥態度。故本文則以「多元文化觀」[10]、「民族

---

9 在 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中，有關全球化評價的題組原爲三題：「各國及各地區之間人、物與資金的交流一直增加，請問您認爲這是好還是不好？(1) 對於台灣的經濟好還不好？(2) 對於台灣人的工作機會好還不好？(3) 對於環境好還是不好？」但由於第三題無法明確判斷環境的意涵爲何，因此本研究僅取前兩題做爲全球化經濟評價。全球化經濟評價的選項從「非常不好」到「非常好」共七尺度，每題分別給予 1 至 7 的分數，建構出全球化經濟評價，最後並標準化爲 0 至 1 分，詳細變項編碼與信度檢測請參見附錄。

10 多元文化由三題構成，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五個尺度，分別給予一至五分，並標準化爲 0 到 1，詳細變項編碼與信度檢測請參見附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義態度」[11] 和「文化偏見」來檢視文化面的影響。其中，多元文化觀和民族主義在問卷中各有特定題組，本研究將分別建構出兩組概念：「多元文化觀」由「禁止東南亞婚姻移民的小孩在學校以越南話或印尼話或其他東南亞語言交談」、「我們應該在中小學課程中增加東南亞歷史文化的教材」、「您的子女或孫子女班上有東南亞婚姻移民生的小孩是一個認識其他文化的機會？」三題構成量表；「民族主義態度」則以「爲了保護我國經濟，台灣應該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即使會導致與其他國家的衝突，台灣都應該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爲主」、「增加與外國電影、音樂或書籍的接觸，對我們自己的文化是有害的？」三題構成量表。

較爲特別的測量操作爲文化偏見，由於問卷並無特定的題組，因此本文將社會距離加以轉化，另行發展出該指標。過去研究較多使用社會距離來討論民眾對外來人口的態度（伊慶春、章英華，2006），透過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與某國家或地區的人民一起工作、成爲鄰居以及通婚，來檢視受訪者對不同族群或外來移民的接納度，該題組中也含括了對不同族群的文化階層化態度。從表 2 可發現，民眾是否願意與不同國家的人成爲生活成員，其中接納意願是有所差異的：臺灣民眾較傾向和歐洲人（2.248 分）和北美人（2.286 分）成爲生活成員，但和東南亞人成爲生活成員的意願較低（1.995 分）。

表 2　民眾與他國移民成為生活成員的意願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樣　本　數
歐 洲 人	2.248	1.121	1,858
北 美 人	2.286	1.107	1,863
東 南 亞	1.995	1.201	1,872

說　　明：分數爲 0～3 分

資料來源：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張苙雲，2008）

[11] 民族主義由三題構成，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七尺度，每題分別給予 1 至 7 的分數，建構出民族主義的量表，最後並標準化爲 0 到 1，詳細變項編碼與信度檢測請參見附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民眾對不同國家的社會距離差異，反映的可能是個人對某些移民族群的偏好情況，個人更容易接納某些地區的移民者，或更排斥哪些移民者。如這次資料呈現的圖樣，相對和東南亞人成爲生活成員，民眾更願意與歐美國家的人們成爲生活成員，而這些差異呈現的可能是一種歐美國家優於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位階圖樣。在台灣，移工多來自東南亞國家以及東南亞配偶的脈絡下，爲了瞭解民眾對歐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社會距離差異，如何影響他們的移民立場，本文將以民眾對歐美及東南亞人的社會距離建構出「文化偏見」變項，數值越大表示民眾越偏好與歐美人成爲生活成員、而不偏好與東南亞人成爲生活成員的感受。計算公式如下：

$$\text{文化偏見} = \frac{\text{對歐洲人社會偏好} + \text{對北美人社會偏好}}{2} - \text{對東南亞人社會偏好}$$

㈢社會接觸面向

有關社會接觸的測量，則可再區分爲一般接觸與實質接觸，一般接觸涉及的只是表面或淺薄性的社會接觸，而實質接觸則是熟人式或深刻性的接觸，前者以「出國頻率」和「與外國人接觸」爲測量指標，後者以「自己或親友中有沒有婚姻移民者及接觸頻率」爲指標（蔡明璋，2011：6-7）。本文使用資料與蔡明璋（2011）使用資料爲同一筆來源，因此社會接觸的指標也採取蔡文之測量方式，一般接觸程度以「請問您曾經到過東南亞旅遊嗎」、「請問您有認識東南亞的人嗎」，實質接觸程度則以「您有沒有認識來自東南亞的婚移與接觸頻率」爲測量指標。[12]

最後其他基本變項，如性別、婚姻狀況、年齡以及省籍變項，則作爲本文模型之控制變項，詳細的變項編碼請參考附錄。

---

[12] 感謝一位審查人的提醒，本文的依變項涉及對移工和婚移兩種的態度，但在社會接觸（自變項）的相關題目中，僅有和東南亞婚移的實質接觸頻率，而無和移工的實質接觸（審查人建議採「接觸東南亞移工或職場上東南亞同事」），但受限於問卷資料的題目，不排除有測量上的問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資料分析

爲了探究哪些因素影響民眾對不同移民的態度，在進行模型檢驗之前，本段將分別針對移工、婚移不同移民身份，進行變項間的相關性檢定。

一、不同解釋和移民態度的相關性檢定

團體利益、文化認同以及社會接觸三種理論解釋和民眾對移工態度之相關性如何？表 3 統計檢定可發現，「團體利益」和「文化認同」的個別解釋確實都與民眾對移工的態度有顯著相關。在「團體利益」面向上，例如全球化經濟評價較低者、國高中以及小學以下的民眾、藍領階級、都市化發展屬於小城鎮和鄉村者，都較傾向減少移工人數。「文化認同」也與民眾對經濟移民態度有顯著相關，例如，相較之下，較不具民族主義價值者、較具有多元文化觀、文化偏見高的民眾，都傾向不減少移工人數。然而，社會接觸對民眾怎麼看待移工的態度，其效果就不如前兩種理論來得明顯，和東南亞地區有一般社會接觸的民眾傾向不減少移工人數，而實質社會接觸反而與民眾的移工態度沒有顯著相關。

與移工態度的相關性比較起來，這三種解釋對民眾的婚移態度又出現些許差異。從表 4 可發現，無論是民族主義、多元文化和文化偏見等「文化認同」皆與民眾對婚移態度有顯著相關，例如較不具民族主義、具有較高多元文化觀的民眾都較不排斥東南亞配偶。有趣的是在文化偏見上，對兩類移民具有不同影響：在表 3 中，文化偏見較高（偏好歐美）的民眾傾向不減少移工人數，但在表 4 卻可發現他們反而傾向減少東南亞配偶人數。這樣的初步發現將在後面統計模型中進而探討。

另外，雖然「團體利益」也與民眾對東南亞配偶的態度有相關，但與移工態度不同的是，職業階級和都市化程度並不影響民眾對東南亞配偶的態度，只有全球化經濟評價和教育程度才具有顯著相關性。最後在社會接觸，無論一般或實質社會接觸都與民眾對東南亞婚移的態度，沒有顯著相關，不過在表 3、表 4 的對照下可發現，民眾有可能因爲一般性的社會接觸而較接納移工，但並不會因爲有社會接觸的經驗而改變對婚移的限制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場，顯示民眾在面對不同移民屬性上，社會接觸確實有可能產生差異效果。

表 3　三種解釋與民眾對在台工作的外國人立場之相關性檢定

		減　少	不減少	樣本數	檢定結果
團體利益					
全球化經濟評價	低	70.6% (+)	29.4% (–)	688	χ^2=59.514 df=1 p<.001
	高	52.4% (–)	47.6% (+)	1164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73.7% (+)	26.3% (–)	357	χ^2=198.619 df=3 p<.001
	國高中	69.8% (+)	30.2% (–)	852	
	專科	50.9% (–)	49.1% (+)	234	
	大學以上	34.5% (–)	65.5% (+)	476	
職業階級	高階白領	43.6% (–)	56.4% (+)	337	χ^2=70.726 df=2 p<.001
	中低階白領	58.6%	41.4%	573	
	藍領	74.3% (+)	25.7% (–)	389	
都市化程度	大都市	50.6% (–)	49.4% (+)	563	χ^2=56.780 df=3 p<.001
	大都市郊區	54.8% (–)	45.2% (+)	467	
	小城鎮	63.4% (+)	36.6% (–)	513	
	鄉村	73.6% (+)	26.4% (–)	375	
文化認同					
民族主義	低	47.2% (–)	52.8% (+)	927	χ^2=110.870 df=1 p<.001
	高	71.0% (+)	29.0% (–)	972	
多元文化	低	66.7% (+)	33.3% (–)	1203	χ^2=72.808 df=1 p<.001
	高	46.9% (–)	53.1% (+)	706	
文化偏見	低	61.0% (+)	39.0% (–)	1375	χ^2=7.069 df=1 p<.01
	高	53.9% (–)	46.1% (+)	440	
社會接觸					
實質接觸程度	低	58.8%	41.2%	1228	χ^2=0.745 df=1 p>.05
	高	60.8%	39.2%	694	
一般接觸程度	沒有	63.1% (+)	36.9% (–)	941	χ^2=9.376 df=1 p<.01
	有	56.3% (–)	43.7% (+)	981	

說　　明：1. (+) 表示調整後殘差值 >1.96；(–) 表示調整後殘差值 <–1.96。

2. 全球化經濟評價、多元文化、民族主義、文化偏見、社會接觸皆爲連續變項，以平均數爲切點，分爲高低兩組進行卡方檢定。

資料來源：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張苙雲，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三種解釋與民眾對東南亞配偶立場之相關性分析

		減　少	不減少	樣本數	檢定結果
團體利益					
全球化經濟評價	低	69.5% (+)	30.5% (–)	685	χ^2=13.324 df=1 p<.001
	高	61.1% (–)	38.9% (+)	1158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60.9%	39.1%	350	χ^2=110.626 df=3 p<.05
	國高中	68.2% (+)	31.8% (–)	846	
	專科	61.8%	38.2%	233	
	大學以上	60.8%	39.2%	474	
職業階級	高階白領	63.1%	36.9%	333	χ^2=4.562 df=2 p>.05
	中低階白領	67.0%	33.0%	570	
	藍領	60.4%	39.6%	381	
都市化程度	大都市	64.6%	35.4%	559	χ^2=1.5330 df=1 p>.05
	大都市郊區	65.7%	34.3%	466	
	小城鎮	62.0%	38.0%	511	
	鄉村	64.6%	35.4%	367	
文化認同與威脅					
民族主義	低	59.2% (–)	40.8% (+)	917	χ^2=19.241 df=1 p<.001
	高	68.9% (+)	31.1% (–)	974	
多元文化	低	69.5% (+)	30.5% (–)	1195	χ^2=39.025 df=1 p<.001
	高	55.2% (–)	44.8% (+)	701	
文化偏見	低	61.3% (–)	38.7% (+)	1371	χ^2=20.570 df=1 p<.001
	高	73.2% (+)	26.8% (–)	441	
社會接觸					
實質接觸程度	低	64.1%	35.9%	779	χ^2=0.016 df=1 p>.05
	高	35.7%	64.3%	444	
一般接觸程度	沒有	62.5%	37.5%	934	χ^2=2.140 df=1 p>.05
	有	65.7%	34.3%	972	

說　　明：1. (+) 表示調整後殘差值 >1.96；(–) 表示調整後殘差值 <–1.96。
2. 全球化經濟評價、多元文化、民族主義、文化偏見、社會接觸皆爲連續變項，以平均數爲切點，分爲高低兩組進行卡方檢定。

資料來源：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張苙雲，2008）

根據上述相關性檢定可發現，「團體利益」和「文化認同」大多都與民眾對移工、婚移的態度有所關連，而「社會接觸」對移工及婚移態度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效果則多爲不顯著，僅有一般接觸對移工態度有影響，而實質接觸和一般接觸對婚移態度都沒有影響，社會接觸造成的效果不同，可能與兩者移民性質不同有關。移工屬於政策上隔離性的群體，當民眾有東南亞一般社會接觸的經驗後，對移工態度也會較爲友善，或許與移工所涉及的影響層面較不敏感有關；而臺灣的東南亞婚移已趨於普遍，民眾與婚移者的社會接觸也逐漸頻繁，但民眾並未因爲社會接觸的經驗而改變對婚移接納的態度，近來的研究也有類似接觸效果有限的觀察（陳志柔、于德林，2005；蔡明璋，2011；張翰璧、張晉芬，2013）。另一方面，社會接觸的影響效果不一，也和不同研究者所採用的依變項不同有關，因爲各涉及到不同的政治層次，使得社會接觸出現不同效果。例如陳志柔等公民權的概念是高度政治性的，相對容易受到政治傾向而非社會接觸的影響；而伊慶春等人使用測量通婚意願，則容易受到社會接觸的影響；不同研究者探討的議題因爲涉及到不同的問題層次，使得社會接觸效果較難以有一致的歸因與定論。

本文初步相關性檢定發現，民眾對移工／婚移的態度主要仍與團體利益和文化認同有關，不過團體利益中的職業階級、都市化發展並沒有與民眾對東南亞婚移的態度有所相關；文化認同中的文化偏見對民眾的兩類移民態度皆有相關，但卻產生不同的態度方向，而社會接觸僅有一般接觸與移工態度有關。初步分析確實顯示民眾在面對不同移民屬性時，團體利益、文化認同以及社會接觸都有可能產生差異性的效果，下節將透過模型操作，更細緻討論這三種理論對移民態度的影響效果。

二、模型分析與解釋

根據依變項的處理方式，本文在模型操作方面採用「二元勝算對數模型」進行分析。模型中並放入個人基本變項做爲控制，結果顯示性別、年紀都會影響民眾對兩類移民群體的態度。在性別上，發現男性比女性傾向不減少移民人數，過去討論臺灣民眾對婚姻移民者的態度上也有類似的趨勢（陳志柔、于德林，2005；伊慶春、章英華，2006；蔡明璋，2011）。而年齡上，相對年輕群體而言，中壯年者則傾向採取限制移民的立場，而老年人則無顯著差異。婚姻狀況則僅影響民眾對婚移的態度，單身者比已婚者傾向不減少婚移人數。在此次模型中，省籍與民眾的移民態度之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無顯著關係。

在控制這些基本變項後，影響民眾對兩類移民群體的態度：團體利益、文化認同以及社會接觸三種理論的解釋情況是如何？從表 5 模型 1、2 結果發現，無論是對經濟移民或東南亞配偶的態度，團體利益和文化認同都有解釋力，然而認爲透過接觸可以減少對移民族群敵意的社會接觸理論，在此模型中並不顯著，無論實質或一般的社會接觸，實際上並不影響民眾怎麼看待移民。

表 5　民眾對經濟移民、婚姻移民態度的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模型 1：在台外國工作者人數（不減少＝0）			模型 2：東南亞配偶人數（不減少＝0）		
		係　數	標準誤	Exp(B)	係　數	標準誤	Exp(B)
常　　數		.885	.557	2.423	2.551	.549***	12.817
團體利益	全球化經濟評價	−1.239	.296***	.290	−.866	.282**	.421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838	.232***	2.311	−.593	.225**	.553
	教育程度 國高中	.813	.153***	2.255	−.001	.155	.999
	教育程度 專科	.301	.179	1.352	−.220	.183	.802
	職業階級 中低階白領	.283	.130*	1.327	.201	.130	1.222
	職業階級 藍領	.536	.167*	1.710	−.074	.153	.929
	都市化 都市市郊	.065	.144	1.067	−.099	.144	.906
	都市化 小城鎮	.282	.145	1.325	−.365	.143*	.694
	都市化 鄉村	.467	.174*	1.596	−.131	.165	.877
文化認同	多元文化	−2.248	.512***	.106	−2.322	.496***	.098
	民族主義	1.720	.383***	5.587	.982	.372**	2.670
	文化偏見	−.013	.056	.987	.226	.057***	1.254
社會接觸	實質社會接觸	−.695	.428	.499	-.525	.412	.591
	一般社會接觸	−.119	.167	.888	−.018	.164	.982
個人基本變項	男性	−.282	.113*	.754	−.701	.110***	.496
	婚姻 單身	−.225	.123	.799	−.248	.120*	.780
	年齡 40～59 歲	.375	.138**	1.454	.345	.135*	1.412
	年齡 60 歲以上	−.221	.210	.802	.246	.206	1.279
	省籍 父 閩南	.238	.205	1.269	−.051	.207	.951
	省籍 父 客家	.433	.275	1.542	.136	.272	1.146
	省籍 母 閩南	.047	.242	1.048	.241	.242	1.272
	省籍 母 客家	−.188	.307	.828	.053	.300	1.054
模型檢定資訊		樣本數=1745 G^2(LR χ^2)=341.859, df=22, p<.001 正確預測率=69.9% Cox & Snell Pseudo-R^2=0.178			樣本數=1743 G^2(LR χ^2)=158.654, df=22, p<.001 正確預測率=66.3% Cox & Snell Pseudo-R^2=0.087		

說　　明：*：p<.05；**：p<.01；***：p<.001

資料來源：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張苙雲，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本模型中影響民眾對兩類移民態度的關鍵，還是在於團體利益和文化價值的層面上。雖然團體利益和文化價值的面向皆影響民眾對移工、婚移的態度，但還是存在差異，因此以下將針對這些解釋途徑逐步檢視。

㈠團體利益解釋

團體利益確實影響民眾對移工的態度。在模型 1 中，團體利益的影響特別明顯，全球化經濟評價、教育、階級和都市化的變項皆影響民眾對移工的態度。例如，全球化經濟評價與民眾對移工的態度有正相關；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下、國高中的民眾，認爲要減少移工人數的勝算比，分別是大學以上的 2.311、2.255 倍；中低階白領和藍領階級者認爲要減少移工人數的勝算比，則是高階白領的 1.327、1.710 倍；而鄉村民眾認爲要減少移工人數的勝算比，則是都市民眾的 1.596 倍。換言之，這些對全球化經濟評價較低、處於教育、職業階級和都市化利益受損的民眾，相對也較傾向減少移工人數。

在東南亞婚移的態度部分，職業階級並沒有顯著影響，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教育程度和都市化發展影響民眾對東南亞婚移人數的態度，但影響效果卻不同於民眾對移工的態度。在教育程度部分，小學以下的民眾認爲應減少東南亞婚移的勝算比，僅是大學以上民眾的 0.553 倍，居住在小城鎮的民眾認爲應減少東南亞婚移的勝算比，也只是城市民眾的 0.694 倍。換言之，相較大學以上和城市民眾而言，小學以下的民眾和居住在小城鎮的民眾並不傾向減少東南亞配偶的比例。當我們比較模型 1、2 就可明顯發現，屬於低社經地位的民眾，在面對移工時較抱持反對立場，但對東南亞婚移人數則抱持較不反對的立場。這可能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資本全球化下造成低階勞動者在經濟市場上的劣勢，利益衝突下傾向反對移工帶來的市場競爭，但另一方面，他們在婚姻市場上也被邊緣化而不容易找到婚嫁對象，外籍配偶的進入某程度能滿足婚姻需求，因而呈現出他們對不同移民身份的態度差異。

如同國外研究發現，團體利益對民眾的移民態度是很有解釋力的理論，這些處於低階社經地位的勞動者在資源競爭性的環境中，大規模的移民現象容易對他們造成威脅感，而容易排斥外來移民（McLaren, 2003: 9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cheepers et al., 2002），尤其移工的經濟目的更直接涉及到民眾對經濟競爭的威脅感。無論移工或婚移，團體利益都會影響民眾的移民態度，進一步區分不同移民類別就會發現，利益衝突僅出現在民眾對移工的態度，但並不會反應在民眾對婚移的態度上，甚至可以發現教育程度較低者反對移工，但並不反對婚移的態度。

㈡文化認同解釋

文化認同與價值同樣也影響民眾對兩種移民者的態度，其中最大的差異則是「文化偏見」的效果。首先從模型中可知，無論對象是移工或東南亞婚移，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越具有多元文化價值的民眾，採取不減少移民人數的勝算比越高。換言之，多元文化是有助於民眾抱持接納移民族群的態度。

然而，民族主義產生的效果與多元文化價值截然不同。從前述的理論回顧，民族主義價值代表的是一種社會認同，強調我群概念的價值觀，有些研究發現民族主義和反移民態度有正向關係，但也有研究指出我群認同與排斥移民不一定相關。而在本文模型中發現這兩者有顯著關係，無論模型 1 或模型 2，民族主義態度越高的民眾，都傾向減少國內移工或婚移人數的勝算比就越高。換言之，當國內越強調我群認同的民族主義時，其實會影響民眾對外來移民的排斥性。

在文化層面的變項中，最特別的是文化偏見的效果。從模型 1 中發現文化偏見並不影響民眾對移工的態度，但模型 2 卻發現越偏好歐美文化（越願意與歐美人成爲生活成員）的民眾，支持減少東南亞婚移人數的勝算比也越高。也就是，文化偏見其實影響民眾怎麼看待東南亞婚移，但卻不影響民眾對移工的態度。這可從不同移民身份所代表的意涵差異來討論，移工在我國法規政策下被界定爲短期居留、經濟性的移民過客，但東南亞婚移就不同了，這些他群涉及到的是將來成爲國家內部的我群成員。在此，文化偏見反映出來的是，個人對我群概念中的理想圖樣，文化偏見使個人更容易接納或更排斥哪些將來要成爲我群的移民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㈢社會接觸的緩和效果？

有關社會接觸的效果，在模型加入個人基本變項、團體利益和文化認同之後，社會接觸的效果消失，[13] 顯示無論實質或一般的社會接觸對移民態度影響確實有限，影響民眾移民態度的主要因素仍舊是團體利益和文化認同。然而以往文獻也指出接觸理論和利益競爭或認同威脅之間可能存在互補性，社會接觸有可能產生熟悉感，而調和了因移民產生的經濟競爭和文化威脅感（Schneider, 2008；Savelkoul et al., 2010），降低民眾反移民的態度。因此，本文進而檢視團體利益和文化認同是否可能和社會接觸產生交互作用，緩和民眾對移工和婚移的限制態度。

不過在表6 卻發現，[14] 社會接觸的緩和效果並沒有出現，無論一般或實質社會接觸，與團體利益和文化認同的交互效果並沒有顯著，顯示民眾的利益衝突或文化威脅並沒有因爲有一般或實質社會接觸的經驗，而緩和反移民的立場，爲何社會接觸理論對臺灣民眾對移民態度的影響效果有限，我們可以從移工和婚移所處的政策與社會脈絡差異中來尋找解釋。

在移工方面，民眾對移工的態度不受實質及一般性社會接觸的影響，這回應了前文論及的我國對移工政策的定位，由於我國政策將移工定位爲短期補充性、並將移工放置於統一管理的隔離性環境之中，只有特定場所較容易接觸到移工族群，一般民眾並非可經常接觸到此族群，確實也讓社會接觸的效果難以產生廣泛影響。對於婚移而言，雖然並非隔離性政策，但是社會接觸的效果可能必須在特定脈絡下才會產生影響，如蔡明璋（2011）引述 Allport 的解釋，認爲族群間的平等地位、社會民眾已經具備接納移民成爲社會共同成員的目標，以及相關制度支持等條件，社會接觸才可能帶正面效果。而我國目前社會環境尚未成熟具備這些條件，無論是實質經濟或是文化歧視面上，外籍配偶仍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與一般民眾互動，

---

[13] 回應審查人對於社會接觸可能存在中介性效果的疑問，經作者交叉分析以及模型分析後，社會接觸與移民態度不存在顯著相關，因而無中介性影響。考量本文的篇幅，相關分析表格不放於本文。

[14] 模型中與社會接觸做交互作用的變項，是以社會接觸和團體利益、文化認同先做相關性檢定，並在表 5 模型中有顯著影響的變項，才進行交互作用的變項處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6　社會接觸與團體利益、文化認同對移民態度之交互情況

		模型 1：在台外國工作者人數（不減少＝0）			模型 2：東南亞配偶人數（不減少＝0）		
		係　數	標準誤	Exp(B)	係　數	標準誤	Exp(B)
常　　數		.288	.705	1.334	2.944	.709***	18.996
團體利益	全球化經濟評價	−.911	.395*	.402	−1.183	.379**	.306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597	.299*	1.816	−.605	.273**	.546
	教育程度 國高中	.664	.210**	1.943	.003	.156	1.003
	教育程度 專科	.286	.181	1.331	−.226	.184	.798
	職業階級 中低階白領	.202	.177	1.224	.207	.130	1.230
	職業階級 藍領	.361	.207	1.435	−.063	.154	.939
	都市化 都市市郊	.048	.146	1.049	−.103	.145	.902
	都市化 小城鎮	.265	.146	1.304	−.468	.194*	.626
	都市化 鄉村	.718	.233**	2.050	−.142	.167	.867
文化認同	多元文化	−1.455	.712*	.233	−2.198	.694**	.111
	民族主義	1.663	.537**	5.275	.647	.502	1.910
	文化偏見	−.051	.070	.951	−1.716	1.463	.180
社會接觸	實質社會接觸	−.286	.670	.751	.222	.633	1.249
	一般社會接觸	1.850	1.495	6.362	−1.716	1.463	.180
個人基本變項	男性	−.285	.115*	.752	−.720	.112***	.487
	婚姻 單身	−.245	.125*	.783	−.242	.121*	.785
	年齡 40～59 歲	.396	.139**	1.487	.354	.136**	1.424
	年齡 60 歲以上	−.225	.212	.799	.241	.207	1.272
	省籍 父 閩南	.235	.207	1.265	−.068	.209	.934
	省籍 父 客家	.414	.278	1.514	.127	.273	1.135
	省籍 母 閩南	.069	.246	1.072	.238	.244	1.269
	省籍 母 客家	−.156	.310	.855	.041	.302	1.041
社會接觸與團體利益之交互效果	全球評價*一般	−1.364	.946	.256	1.138	.878	3.122
	小學*實質	.250	.568	1.284	.039	.448	1.039
	小學*一般	.464	.626	1.590	.029	.516	1.029
	國高中*實質	−.035	.389	.965			
	國高中*一般	.404	.380	1.498			
	中低白領*一般	.231	.370	1.260			
	藍領*一般	.857	.534	2.356			
	鄉村*實質	−.782	.438	.458			
	鄉村*一般	−.160	.512	.852			
	小城鎮*實質				.113	.361	1.120
	小城鎮*一般				.224	.374	1.251
社會接觸與文化認同之交互效果	民族主義*實質	−.268	.586	.765	−.670	.464	.512
	民族主義*一般	.353	1.122	1.424	1.599	1.038	4.949
	多元文化*一般	−2.244	1.546	.106	−.130	1.469	.878
	文化偏見*實質	.181	.173	1.199	−.150	.170	.861
模型檢定資訊		樣本數=1745 G^2(LR χ^2)=359.158, df=35, p<.001 正確預測率=69.7% Cox & Snell Pseudo-R^2=0.186			樣本數=1743 G^2(LR χ^2)=165.109, df=31, p<.001 正確預測率=66.5% Cox & Snell Pseudo-R^2=0.090		

說　　明：*：p<.05；**：p<.01；***：p<.001

資料來源：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張苙雲，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者民眾也尚未普遍接納婚移者成爲社會共同體成員，我國婚移政策上也對此有較多限制，若社會接觸要產生正面效果，這些跨族群的接觸就必須建立在去族群、去種族的氛圍下，彼此有共同建構社區與強化社會連帶的共識下互動，這種社會接觸才能有效降低偏見（蔡明璋，2011：15-19）。社會接觸不一定就會產生正面效果，如張翰璧和張晉芬（2013）最新研究也發現，社會接觸經驗對於移民政策態度的效果並不顯著，或出現負面影響。在移工態度上，有一般社會接觸經驗會支持更多移工進入台灣，但實質社會接觸會出現相反效果，接觸越多、越深入，反而對移工產生排斥（2013：153），在東南亞婚移態度上，一般社會接觸並不顯著，而實質社會接觸也出現負面效果，其因可能是社會接觸雖然增加了個人友誼，但仍無法解除民眾對更多移民進入台灣的疑慮（2013：160）。

陸、結論

反移民的態度研究，自 1990 年以來廣受國際社會重視。反移民的主張，在此全球化移動頻繁的時代，以及國際人權的呼籲下，似乎是一種政治上不合理且過時的現象，但在現實上許多國家又普遍存在反移民的政治動員。在歐美多國的大選中，移民成爲重要的政治議題，甚至切割舊的政治分歧，轉化爲新的政治分歧，傳統隸屬於左派的勞工階級，轉爲新右派本土排外的民族主義的支持者。人們對於移民，既要高談包容卻又無法避免地排他，此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顯示出對移民的態度仍夾處在多重矛盾中，這些矛盾可能是價值性與利益性的：既無法免於全球化的開放性，卻又流連於民族主義的安全感；既想要尊重多元文化，卻又無法免於文化偏見；既想要接收移民帶來的經濟利益，但又不想要承擔可能的成本；在接觸的同時，同時感受到熟悉與威脅。凡此種種，正反映在對移民的對立性態度中。

對移民的態度，往往受到團體間的利益衝突、文化認同以及團體接觸等因素的影響。然而，這些因素的作用並非是一致的，對不同移民的態度正夾雜在這些不同因素的拉鋸之中。本國民眾面對不同的移民時，可能有態度傾向的差異並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在臺灣，經濟移工以東南亞移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多數，外籍配偶也有多數來自於東南亞，兩者來源相近幾乎在同時期進入台灣，但進入台灣後被分配承擔不同的社會角色（生產 vs. 再生產、短期非公民 vs. 長期公民）。就資料顯示，無論移工或婚移，多數民眾皆採取了限制移民的立場，但對這兩類移民群體的態度還是存在差異：民眾接納移工的比例遠高於接納婚移。從接納移工和婚移的比例上，便顯示出民眾對不同移民身份的態度，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進而產生接納差異。

透過模型討論這三種解釋與反對移民態度的關係，研究發現團體利益和文化價值，兩者程度不一地影響民眾對移工或東南亞婚移的態度。團體利益（包含全球化經濟評價、教育、職業階級、都市化）同時影響了對移工和婚移的態度，但是對移工和婚移的態度有著完全相反的影響。就團體利益的影響來看，利益衝突是影響民眾反對移工的重要因素，在本文模型中也清楚可見教育程度較低、藍領階級以及鄉村民眾都傾向限制移工人數，在臺灣經濟資源的競爭環境下，外來移工容易讓低階社經階級的勞動者產生威脅感，進而排斥之。不過利益衝突並沒有顯現在民眾對婚移的態度上，處於較低階層的民眾並不反對婚移的進入，反而可能因團體利益需求而支持更多婚移，這樣的現象其實也回應到全球資本主義深化下的結果（夏曉鵑，2000），處於社會弱勢位置的民眾在就業市場失利，因而呈現出排斥移工；另方面，在上嫁下娶的婚姻關係中，無法與國內社經地位高的民眾競爭，必須透過東南亞婚移的進入來補充婚姻需求，而呈現出不排斥的態度。

文化認同（包含民族主義、多元主義、和文化偏見）同時影響移工和婚移，但是對婚移的影響大於對移工的影響，其中民族主義和多元主義同時影響兩者，但文化偏見只影響對婚移的態度而不影響對移工的態度。多元文化價值觀有助於民眾接納不同移民，而民族主義則強化對移民的排斥，這兩個因素對移民態度產生一正一反的作用力。在文化層面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化偏見的效果，本文所操作的文化偏見概念，其實是在種族主義之下衍生的對不同族群的階層化態度，而此種文化偏見只影響民眾對東南亞婚移的態度，但不影響民眾對移工的立場。這可能與移民類別所代表的身份意義有關，由於移工在我國法規政策下被界定爲短期生產性的過客，而東南亞婚移涉及到的是將來成爲我群成員。而文化偏見反映出來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臺灣民眾對我群概念的階層化想像，當民眾偏好歐美人而排斥東南亞成爲生活成員時，文化偏見使個人更容易接納或更排斥某一群將要成爲我群的移民者。當然，這並非意味著民眾對於移工不存在種族歧視與文化偏見，但是當政策上將移工與婚移定位爲和本國民眾不同的互動模式時（隔離性與揉和性），文化偏見歧視會使得本國民眾反對更多的外籍配偶，但不會反對更多的移工。

當我們回頭再去思考爲何民眾接納移工的比例高於婚移比例之時（表1），或許我們可以從這些影響因素中找尋解釋。因爲移民屬性的差異，移工多爲經濟性、短期聚集性居留的客工，政策上的限制也使得他們形成一種被隔絕的生活樣貌，較少融入本國人的生活圈，對於台灣本身的文化衝擊或是實質生活的影響相對有限，且不涉及到國家的公民身份問題，因而對其排斥者主要是本國居於特定社會位置且相對社經弱勢者。相較之下，婚移屬於長期性且分散於社會各家庭之中，進入一般民眾的生活圈中，並且有機會取得台灣的公民身分，對於台灣的社會組成產生深刻且全面性的影響，因此，受到影響的對象並非特定群體，而是對國家成員所認知的集體利益和族群認同產生挑戰，使得民眾對婚移的態度處於更複雜的脈絡之中。且從統計模型中發現，民眾排斥婚移的態度，並不在於實質的經濟利益，而是受更抽象的文化認同影響，其中涉及到文化偏見與國族認同，而此種文化偏見往往顯示於族群優越感之中，所以也可能使得民眾在面對婚移人口時，比面對移工時來得更受此一深層心理因素影響，因此也較不容易採取開放立場，形成民眾接納婚移比例低於接納移工比例的現象。

此外，既然利益衝突影響民眾反對移工的態度，文化偏見影響著民眾反對婚移的態度，那社會接觸究竟是否能減緩民眾對移民既存的文化偏見，以及可能的利益衝突，既有研究中仍未有一致的發現。本文資料模型檢驗後發現，社會接觸的減緩中介效果其實有限。對於移工，因爲經濟利益以及居住的分離，使得實質接觸較少且不容易產生實質性影響；對於婚移，接觸是在特定的文化價值下進行，往往不容易改變長期性的價值取向，相反地更可能的是個人的價值會影響接觸的效果。在文化偏見的影響和利益矛盾的影響下，不論是一般或是實質性的社會接觸，似乎都無法改變民眾對不同移民的態度。因此，僅只是期待民眾在接觸互動後，會自然地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變原有的反對態度，顯然是過於低估民眾反移民態度的社會脈絡與不同根源。本文認爲，惟有理解不同移民類型所帶來的不同挑戰，並在理論與經驗資料上找到民眾反對不同移民的態度根源，方能進一步思考如何透過政策來加以因應。

綜合本文發現，民眾反對移民群體的態度脈絡是複雜且存在差異的。國內探究民眾對外來移民態度的研究相對較爲缺乏，而區辨對不同移民身分的態度調查研究仍付之闕如。跨國比較研究爲了提出一般性的理論解釋，往往簡化了移民樣態，較難描繪出民眾對不同外來移民的態度背後所呈現的複雜利益與文化情感交錯。本研究認爲透過細緻化去區辨反對不同移民的群體及因素，有助於釐清我國在對移民的回應上，所需要思考的不同層次與面向。在理解排斥移民不同的來源的基礎上，對於移工的社會接納，應由實質利益角度著眼，思考在勞動政策上，如何創造一個公平性的勞動框架，讓本勞與移工不因勞動成本的差異，而讓資本家的撿選強化了兩者的勞動抵換與利益衝突，減少本國弱勢階級在全球化經濟交換體制下的被剝奪感，方能改善本國勞工與移工之間的利益矛盾與對立觀感。另外，對婚移的社會接納，由於涉及層面較爲複雜與廣泛，影響對象也並非特定群體，而是涉及到抽象的文化偏見、集體利益與身分認同。其中，多元文化的政策推動有助於移民接納，但民族主義的我族認同仍持續深化本國民眾和移民的邊界，文化偏見同樣地不利於對移民的接納。如何透過公民意識教育，降低因民族認同與文化偏見產生的種族階層化歧視，強化不同群體間的社群連結，這些都是未來移民政策，需加以審愼因應的面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1　變項編碼

概　　念	問　卷　題　目	編　　碼
民眾對外籍工作者人數的態度	請問您認爲在臺灣工作的外國人數應該增加還是減少？	0. 不減少 1. 減少
民眾對外籍配偶人數的態度	請問您認爲在臺灣東南亞籍新娘的人數應該增加還是減少？	0. 不減少 1. 減少
利　益　衝　突		
全球化經濟評價	各國及各地區之間的人，物與資金的交流一直增加，對於臺灣的經濟好還不好？ 各國及各地區間的人，物與資金的交流一直增加，對於臺灣人的工作機會好還不好	選項從「非常不好」到「非常好」共七尺度，每題分別給予一至七的分數，建構出全球化經濟評價，數字越高，評價越好，最後並標準化爲 0～1 分，其信度檢定爲 0.755。
教育程度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以下　　3. 專科 2. 國高中　　4. 大學以上
職業階級	您目前主要是在做什麼工作？職業代碼	1. 高階白領階級和專業人士：管理人員、專業人員 / 含工程師 2. 中低階白領階級：助理（半）專業人員（含技術員）、事務工作人員與其它類似技術層級者、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3. 藍領階級：含農林漁牧工作人員、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非技術工 4. 其他：軍人、學生、家管和無正式工作者
都市化	請問您覺得你住的地區是都市或鄉村？	1. 大都市　　3. 小城鎮 2. 大都市旁的郊區　4. 鄉村
文　化　認　同		
民族主義	爲了保護我國經濟，臺灣應該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	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七尺度，每題分別給予一至七的分數，測量方向已轉置，數字越高，表示越具有民族主義。三題加總後標準化爲 0 到 1，其信度檢定爲 0.499。
	即使會導致與其他國家的衝突，臺灣都應該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爲主	
	增加與外國電影，音樂或書籍的接觸，對我們自己的文化是有害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概　　念	問　卷　題　目	編　　碼
多元文化觀	禁止東南亞婚姻移民的小孩在學校以越南話或印尼話或其他東南亞語言交談	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五個尺度，分別給予一至五分，測量方向已轉置，數字越高，越具多元文化觀。三題加總後標準化爲 0 到 1，其信度檢定爲 0.367。
	我們應該在中小學課程中增加東南亞歷史文化的教材？	
	您的子女或孫子女班上有東南亞婚姻移民生的小孩是一個認識其他文化的機會	
文化偏見	下列這些國家或地區的人要成爲您生活中的一員，您的感受如何？（東南亞人、歐洲人、北美人） 1. 在工作上與您共事 2. 成爲您的鄰居 3. 因爲結婚而成爲您的近親	選項爲「0.不好」、「1.好」，依序給分。總分爲 3 分。 爲了測量民眾對歐美與東南亞人的距離差異（3～3 分），因此計算方式爲：（歐洲人＋北美人）/2－東南亞人。分數越大，表示民眾越偏好與歐美人共同生活的感受。
社　會　接　觸		
一般接觸程度	請問您曾經到過東南亞旅遊嗎？	選項爲「0.沒有」、「1.有」，二題加總後標準化爲 0～1。數值越大表示一般接觸程度越高。
	請問您有認識東南亞的人嗎（當地的人）？	
實質接觸程度	請問您有沒有認識來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同住家人除外）	合併爲「0. 沒有認識／從來沒接觸」、「1. 去年一年都沒有接觸」、「2. 一年一次」、「3. 每年數次」、「4. 每個月一、二次」、「5. 每個星期一次」、「6. 每個星期數次」、「7. 每天接觸」，依序給分並標準化爲 0～1。數值越大表示實質接觸程度越高。
	請問您常不常和這些人接觸？（同住家人除外）	
個　人　基　本　變　項		
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婚姻狀況	您的婚姻狀況是？	1. 已婚（已婚、同居） 2. 單身（配偶去世、離婚、分居、未婚）
年齡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1. 20～39 歲 2. 40～59 歲 3. 60 歲以上
父母省籍	請問您父親／母親是哪裡人？	1. 臺灣閩南人　3. 大陸各省市 2. 臺灣客家人　4. 臺灣原住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伊慶春、章英華，2006，〈對娶外籍與大陸媳婦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要性〉，《臺灣社會學》，12: 191-232。

江豐富，2006，〈外勞引進對本國勞工失業、職業選擇及薪資的影響〉，《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37(1): 69-111。

吳秀照，2006，〈層層控制下不自由的勞動者：外籍家戶勞動者勞動條件、勞雇關係及管理政策析論〉，《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0(2): 1-48。

李　誠，2007，〈外勞在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羅紀瓊（編），《臺灣外籍勞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頁 1-20。

夏曉鵑，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爲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 45-92。

夏曉鵑，2005，〈全球化下台灣的移民／移工問題〉，瞿海源、張苙雲（編），《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臺北：巨流出版社，頁 329-365。

張苙雲，2008，《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全球化組》，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張翰璧、張晉芬，2013，〈全球化效果的侷限：台灣民眾對接納跨國移民的態度〉，《台灣社會學刊》，52: 131-167。

陳志柔、于德林，2005，〈臺灣民眾對外來配偶移民政策的態度〉，《臺灣社會學》，10: 95-148。

陳雪慧，2007，《看見臺灣國族的新面貌－婚姻移民法令的歧視與排除》，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勞委會職訓局，2010，〈當前外籍勞工政策〉，勞委會職訓局網頁，http://www.evta.gov.tw/topicsite/content.asp?mfunc_id=89&func_id=89&type_id=0&cata_id=0&site_id=5&id=21937&mcata_id=675&SearchDataValue=，2012/09/20。

勞委會職訓局，2012a，〈外籍專業人士數據〉，勞委會職訓局網頁，http://statdb.cla.gov.tw/html/mon/212090.htm，2012/9/23。

勞委會職訓局，2012b，〈外籍勞工數據〉，勞委會職訓局網頁，http://statdb.cla.gov.tw/html/mon/212020.htm，2012/9/23。

勞動部，2014，〈外籍勞工統計〉，勞動部網頁，http://statdb.cla.gov.tw/html/com/st1002.htm，2014/6/19。

曾嬿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臺灣社會學刊》，32: 1-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婉瑩、李品蓉，2009，〈大陸配偶的公民權困境－國族與父權的共謀〉，《台灣民主季刊》，6(3): 47-86。

廖元豪，2006，〈全球化趨勢中婚姻移民之人權保障：全球化、臺灣新國族主義、人權論述的關係〉，《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4(3): 81-129。

趙彥寧，2004，〈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中國婚姻移民爲研究案例〉，《台灣社會學刊》，32: 59-102。

劉梅君，2000，〈「廉價外勞」論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 59-89。

蔡明璋，2011，〈從接觸到接受？婚姻移民支持的態度在檢視〉，《研究臺灣》，7: 1-23。

蔡明璋、陳嘉慧，1997，〈國家、外勞政策與市場實踐：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7: 69-95。

蔡青龍、林季平，2000，《外籍勞工對本國勞工工作異動之影響分析》，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藍佩嘉，2005，〈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台灣社會學刊》，34: 1-57。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臺北：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

二、英文部分

Allport, G. W. 1954/1979.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Boston: Beacon Press.

Ariely, Gal. 2011. "Globalization,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How the Level of Globalization Affects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5(4) (July 2012): 539-557.

Balibar, Etienne. 1991. "Racism and Nationalism." In *Rece, Nation, Class*, eds.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London: Verso: 37-68.

Billiet, J., B. Maddens, and R. Beerten. 2003. "National Identity and Attitude Toward Foreigners in A Multinational State: A Replic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24(2): 241-257.

Billiet, J., R. Eisinga, and P. Scheepers. 1996. "Ethnocentrism in the Low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Community* 22: 401-416.

Bilodeau, A. and N. Fadol. 2011. "The Roots of Contemporary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in Australia: Contextual and Individual-level Influenc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84(6): 1088-1109.

Blalock, H. M. 1967. *Toward a Theory of Minority 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lumer, H. 1958. “Race Prejudice as a Sense of Group Position.”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 3-7.

Bobo, L. D and Hutchings, V. 1996. “Perceptions of Racial Group Competition, Extending Blume’s Theory of Group Position to a Multiracial Contex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951-972.

Bobo, L. D. 1988. “Group Conflict, Prejudice, and the Paradox of Contemporary Racial Attitudes.” In *Eliminating Racism:Profiles in Controversy*, eds. Katz, P. A. and Taylor, D. A. New York: Plenum Press, 85-114.

Brewer MB and DT Campbell. 1976. *Ethnocentrism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 East African Evidence*. New York: Sage.

Brown, R. 1995. *Prejudice: Its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Blackwell.

Brown, R. 2000.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745-778.

Capozza, Dora and Rupert Brown. 2000. *Social Identity Processes: Trend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London: Sage.

Ceobanu, A. M., and X. Escandell. 2010.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Using Multinational Survey Data: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309-328.

Cohrs, C. and M. Stelzl. 2010. “How Ideological Attitudes Predict Host Society Members’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Exploring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6(4): 673-694.

Davidov, E. 2009.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N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in the ISSP: 34 Countri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litical Analysis* 17(1): 64-82.

De Figueiredo Jr, R. J. P., and Z. Elkins. 2003. “Are Patriots Bigots? An Inquiry into the Vices of In-group Prid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1): 171-188.

Hardin, Russell. 1995. *One for All: The Logic of Group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sia, Hsiao-Chuan. 2009. “Foreign Brides, Multiple Citizenship and Immigrant Movement in Taiwan.” *Asia and the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8(1): 17-46.

McLaren, L. 2003. “Anti-immigrant Prejudice in Europe: Contact, Threat Perception, and Preferences for the Exclusion of Migrants.” *Social Forces* 81: 909-936.

McLaren, Lauren and Mark Johnson. 2007. “Resources, Group Conflict and Symbols: Explaining Anti-Immigration Hostility in 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55(4): 709-732.

Meuleman, Bart, Eldad Davidov, and Jaak Billiet. 2009.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in Europe, 2002-2007: A Dynamic Group Conflict Theory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2): 352-3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hrson, Samuel, Vivian L Vignoles, and Rupert Brown. 2009.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Anti-Immigrant Prejudice: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Effec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72(1): 24-38.

Pettigrew, T. F. 1998.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9: 65-85.

Pettigrew, T. F. and L. R. Tropp. 2006. "A Meta- 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751-783.

Pettigrew, T. F., U. Wagner, and O. Christ. 2007. "Who Opposes Immigration? Comparing German with North American Findings." *Du Bois Review* 4(1): 19-39.

Quillian, Lincoln, 1995. "Prejudice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Group Threat: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Anti-immigrant and Racial Prejudice in Europ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586-611.

Savelkoul, M., P. Scheepers, J. Tolsma, and L. Hagendoorn. 2010. "Anti-Muslim Attitudes in the Netherlands: Tests of Contradictory Hypotheses Derived from Ethnic Competition Theory and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6): 741-758.

Scheepers, P., M. Gijsberts, and M. Coenders. 2002. "Ethnic Exclusionism in European Countries: Public Opposition to Civil Rights for Legal Migrants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Ethnic Threa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17-34.

Schneider, S. L. 2008. "Anti-immigrant Attitudes in Europe: Outgroup Size and Perceived Ethnic Threa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53-67.

Semyonov, M., R. Rijman, and A. Gorodzeisky. 2006. "The Rise of Anti-foreigner Sentiment in European Societies, 1988-20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 426-449.

Sides, John and Jack Citrin. 2007. "European Opinion About Immigration: The Role of Identities, Interests and Inform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3): 477-504.

Sniderman, Paul, Louk Hagendoorn, and Markus Prior. 2004. "Predisposing Factors and Situational Triggers: Exclusionary Reactions to Immigrant Minor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1): 35-49.

Tajfel, Henri.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John C. 1981. "The Experimenta1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Intergroup Behavior,* eds. John C. Turner and H. Gi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6-101.

Wagner, U., O. Christ, T. F. Pettigrew, J. Stellmacher, and C. Wolf, 2006. "Prejudice and Minority Proportion: Contact Instead of Threat Effec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9(4): 380-3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ho Opposes Immigration?

Interest Conflict and Cultural Exclusion Explanations*

*Wan-ying Yang*** & *Ya-wen Chang****

Abstract

Southeast Asian marriage migrants and labor migrants from the same regional origins began entering Taiwan at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and occupy similar marginal posi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hat explains the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among native Taiwanese toward these two groups? Labor migrants are short-term residents serving productive functions which might lead to interest conflicts with existing groups. However, marriage migrants are regarded as a permanent ethnic minority serving reproductive functions. Therefore, these migrants pose challenges to the preexisting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ulture. Such distinctions are reflected in the divergence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se two groups.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the exclus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inter-group interest conflict; in comparison, cultural identity accounts for the social exclusion of marriage migrants. We apply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2008: Globalization" dataset to examine the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toward these two types of migrants. The data show that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different types of migrants are complex and varied. Inter-group interest concerns account for exclusionary attitudes toward migrant workers, but not for those toward marriage migrants. With respect to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discrimination or racism as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is related to the rejection of increasing marriage migrants but not to that of labor

* DOI:10.6166/TJPS.60(43-84)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chi University.
E-mail: wyyang@nccu.edu.tw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chi University.
E-mail: 95252503@n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igrants. In addition,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and labor migrants are both affected by multicultural and nationalist orientations, with multiculturalism conducive to and nationalism detrimental to inclusiveness toward migrants. Through distinguishing the migrants by their status, we can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t types of migrants, and help future policy making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grants and the native population.

Keywords: Marriage Im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Inter-group Interest Conflict, Cultural Identity, Inter-group Contac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